

南开大学跨国公司研究中心

主编：冼国明 张岩贵

2006

第 1 辑

跨国公司论丛

INCS

跨国公司的投资、经营、贸易和管理

跨国公司对社会经济的深远影响和远、中期走势以及近期的变化

跨国公司运作所赖以生存的世界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国际经济形势的波动和国际组织机构及其运作职能的兴废鼎革

跨国公司各层面的理论研究



Y
F276.7
14

跨国公司论丛

(第一辑)

南开大学跨国公司研究中心

主编：冼国明 张岩贵



中国经济出版社

CHINA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跨国公司论丛·第1辑 / 冼国明, 张岩贵主编.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6

ISBN 978 - 7 - 5017 - 7883 - 6

I. 跨… II. ①冼… ②张… III. 跨国公司—理论研究—文集
IV. F276.7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03584 号

出版发行: 中国经济出版社 (100037 ·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北街 3 号)

网 址: www.economyph.com

责任编辑: 李晓岚 (电话: 010 - 68353496, E-mail: xiaolanli@sohu.com)

责任印制: 石星岳

封面设计: 华子图文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承 印: 北京东光印刷厂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张:** 25.5 **字数:** 510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017 - 7883 - 6/F.6885 **定 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68359418 68319282

服务热线: 68344225 68369586 68346406 68309176

顾问

滕维藻 熊性美 王林生 高尔森 蒋哲时
罗肇鸿 巫宁耕 薛敬孝

编辑委员会

主 编：冼国明 张岩贵

编委会成员：（按姓氏笔画排名）

毛蕴诗 田贵明 史祺
陈舜 邱立成 佟家栋
冼国明 杨光明 张诚
张岩贵 蒋殿春 葛顺奇
詹晓宁 薛求知 戴金平

序 言

20世纪下半期以跨国公司为载体的经济全球化表现出一种外向的，突破国界、洲界的限制，走向全球的趋向，这种经济全球化所致的社会进步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50余年前发表的《共产党宣言》所明确描述的那样：工业革命和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这里的文学似喻指文化或文明）

现代跨国公司在世界走向全球化的环境下龙腾虎跃，迅速壮大，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生力军，各种定义的跨国公司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和技术转让等多种方式，在其母国和东道国建立了众多的分支机构，形成了全球的经营体系。一家跨国公司无不同时藏身于三个经济空间：国内空间，这里有母公司及其国内子公司的身躯；国外空间，这里有国外子公司的触角；国际空间，这里有各子公司以及母公司与各子公司以及独立企业之间的资、财、人、物的交换。跨国公司在三个空间的运转已使它们自己成为在母国、东道国及第三国微观经济和全球宏观经济领域之间发生相互作用和进行相互渗透的经济巨人。因此，跨国公司的经营和影响日益成为企业界、学术界和举世公众所关注的对象。

人们关注跨国公司的投资、经营、贸易和管理，关注跨国公司对社会经济的深远影响和远、中期走势以及近期的变化，关注跨国公司运作所赖以生存的世界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也关注国际经济形势的波动和国际组织机构及其运作职能的兴废鼎革，还关注走上坡路的跨国公司各层面的理论研究，所有这些方面都是《跨国公司论丛》的探索对象。

就学术探讨而言，关于跨国公司对世界和各国经济发展的正负两面影响，人们见仁见智，至今仍有待识者予以争鸣。诚然，跨国公司的作用从来就是一把双刃剑：跨国公司活动加剧了国际上贸易保护主义与自由贸易论两大潮流的冲突，都又在某种程度上调和着两大潮流的相互排斥，使二者长期地共生并存；跨国公

司活动加速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同时在另一方面又助长各经济集团之间在某种程度上的相互分离的长期存在；跨国公司（当然包括跨国银行）既增强了货币资本国际流动和全球流动的机动性，又催化国际金融领域的制度危机及国际债务危机。西方大型跨国公司的功能与维持既有国际经济秩序相一致，但又通过生产的国际移动客观上为国际劳动分工体系的变革提供前提，并促使从70年代起发展中国家的企业登上国际直接投资舞台，并成为人们新的关注焦点之一。

对于上述人们所关注的课题，跨国公司的研究者和观察者都可写成论文，惠寄本论丛，文章录用后，将酌寄稿酬。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尽管《论丛》还稚嫩，但《论丛》将持续发表跨国公司及其环境世界经济的最新研究成果，热诚期盼国内外理论界和实务界多赐佳作，共襄中国跨国公司学之盛举。^①

编者于南开大学跨国公司研究中心

2006年10月15日

^① 投稿请寄南开大学跨国公司研究中心 E-mail: ctsnk@nankai.edu.cn.

目 录

第一篇

全球发展的概观和前瞻:1945—1990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1)
全球化进程是否如履薄冰	马丁·沃尔夫(26)
中国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分析	魏忠(40)
高等教育服务的国际流动	
——高等教育服务贸易产生的政治经济学解释	张亚(83)
东亚地区国际投资与对外贸易态势的比较分析	赵海波(94)
对我国境内跨国并购行为的分析——一个博弈模型的引入	朱丽(117)
跨国公司转移定价理论研究文献综述	郝勇 张岩贵(130)

第二篇

海外子公司定位:从 I-R 框架到双重嵌入框架	侯仕军(155)
FDI 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及其动态特征	方友林(184)
IT 外包的原因、现状、趋势和影响	陈刚(203)
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地区层面的研究	薄文广(211)
服务业直接投资的条件、区位与方式选择	杨春妮(235)
FDI 与产业集群的互动关系	杨静(253)

- 跨国公司国际分工的巨大变化与中国输入和输出 FDI 张若平 张岩贵(264)
外资企业法与独资形式外资流入 张晓斌(268)
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国际经验比较 董楠(293)
跨国公司全球竞争和投资对亚太经济的影响 张若平 张岩贵(308)

第三篇

- 日产汽车集团之起死回生 郎咸平指导(325)
合谋理论的应用与案例分析 罗建兵(365)
跨国并购理论的历史沿革、研究进展、缺陷和发展方向评析 阎大颖(387)

第一篇

全球发展的概观和前瞻： 1945—1990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编者按

本文作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是“现代世界体系”理论的创始者。他所撰写的文章的内容即是以现代世界体系理论为框架，对二战以来半个多世纪的世事巨变做出评析，并对21世纪初期（至2025年）世界体系演进的可能趋势做出预测。它有助于我们激发对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历史演进与世纪初期的前景预测做出自己的思考和探索，从而使我们对跨国公司所赖以运作的全球环境有一个较清醒的认知。

作者是在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写成此文的，故难免在预测方面有某些局限之处，例如对21世纪初发生的恐怖和反恐怖对世纪经济的影响、石油价格多年高企对全球经济环境的深远影响，都不可能触及。尽管如此，本文仍值得今日读者阅读和思考。^①

从对我们所做的一系列向量的评估分析中可以得出三个结论：第一，1945—1990年这一时期表现出一个康德拉季耶夫周期所有的共同特征（尽管B时期在1990年仍未结束）。第二，美国在世界体系中的霸权地位似乎在这一时期的中期达到了顶峰，70、80年代时开始下降，当然在1990年美国在许多方面仍是世界体系中最强大的国家。第三个结论则更为复杂，其意义也欠明晰。70、80年代除了与康德拉季耶夫B时期和美

^① 本文选辑自特伦斯·K·霍普金斯、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等著的《转型时代——世界体系的发展轨迹：1945—2025》，中文版为吴英译，庞卓恒审校，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国霸权周期相联系或由它们解释的诸现象外，世界体系历史中一系列多样的长期发展趋势也在开始发生逆转，同时因为体系似乎正在达到其结构的渐进线，所以也影响到其他趋势的转型。

我们已选择 1967/1973 年作为这一时期的转折点，准确的年代仍有待进一步论证。我们的理由是，两次主要的经济震荡的发生——在一端是美国通货首次出现严重麻烦，在另一端是欧佩克的石油冲击——而且在这一时期发生的一系列政治事件总起来似乎也意味着与较早期模式的显著背离：这些事件包括 1968 年世界性的革命（事实上持续到 1970 年）、越南的新年攻势、美苏宣布缓和、中美关系正常化、水门事件造成的对美国总统职位的打击。

让我们总结一下已收集的关于两个周期（康德拉季耶夫和霸权周期）的资料，以及诸如一个可能的体系转折点的多方面的资料。

—

1945 年可以被视为一个标准康德拉季耶夫周期 A 时期的开端标志。康德拉季耶夫的高涨期在确定起始年代上明显充满争论，因为对经济扩张的不同计量上（例如，价格、生产、投资和利润率）存在一些滞后，而这种计量又在不同的模式中被强化运用。^① 一些人将始点确定为 1940 年。当然，在二战期间，生产和就业都有一个显著的世界性的扩张，但同时也存在着对固定资本和人员的世界性的破坏，以及对生产和贸易的巨大干预。如果我们希望表示出世界经济的全面扩张，似乎从 1945 年（或甚至再晚几年）开始更为合理些。

事实上，到 1945 年对欧亚大片土地的破坏仍是非常广泛的；生产、贸易和交通受到严重的阻碍，以致在基本食品、衣服和居所上都存在普遍的不足，更不要提大量人口的流离失所了。然而，我们知道这些困难事实上在几年内就被克服了。显著的事实是世界经济随即进入了迅速、稳定且确实是无先例的扩张期。明显的增长伴随着 1950 年朝鲜战争的爆发而发生；其经济影响不仅在北美、西欧和东亚，而且在第三世界的许多地区也都能感受到。

美国在产生并推动这次世界性的经济扩张上起到了核心作用——直接地是通过它在境内的经济活动；间接地则是通过国际援助，主要是对西欧和东亚，对大部分第三世界地区（尤其是拉美和中东）的援助则是有限的。美国的跨国公司在这一时期占了对外直接投资的绝大部分。如前面提到的，最初是在拉美，但很快扩及整个西欧。美元在大量黄金储备支持下，被作为世界金融体系的基础性通货。因而，事实上，正是美国财政

^① 关于不同模式及它们对年代确定所产生的结果的评估，见古德斯坦（Goldstein），1988。关于对目前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的年代确定问题的讨论，见沃勒斯坦，1979。

部和联邦储备委员会的决策，在支配着世界的货币供给。

世界体系作为一个整体在 20 世纪 50、60 年代实现了更大的产出，尤其是所有那些能获得较高利润、所谓主导产业的产品。在马歇尔计划和早期欧洲联合机制推动下的西欧，以及在美国与冷战相关的经济支付刺激下的东亚（尤其、但不仅是日本），不仅完全从战时破坏中恢复过来，而且其主要产业部门也开始在世界市场上具有较高竞争力。它们非常迅速地恢复了对其国内市场的主导地位，到 20 世纪 60 年代就在非国内市场的美国市场上投入积极竞争。

所谓的社会主义集团——其集团外贸易由于美、苏蓄意采取的政策在 50、60 年代被保持在最低水平上——同时也启动了自身的经济扩张。其发展进程强调多样的、且或多或少相似的、谋求集中工业化的民族纲领，结果大大增加了主导产业的世界总产出。在社会主义集团外的第三世界，也同样在追求工业化目标，只是从整体上看，程度不是太强烈。

世界工业产出的大规模扩张增长，当然要求所谓的初级产品生产的大规模增加。这就促动了农业和矿业区的经济繁荣，同时对提高世界体系边缘区国家的收入基础也起到了显著作用。这意味着，正努力寻求从殖民强国那里获取独立而开展运动的许多（也许是大多数）国家，有着（或似乎有着）谋求经济繁荣的追求。这反过来促使赚取工资部门的扩张（在政治独立之前就如此，在政治独立后就更是如此），特别是在国家官僚机构和国家管理的企业中，当然还远不止于此。它也促使用于教育部门和医疗机构的资源出现世界性的大规模增长。总之，从世界规模看，正像一位法国分析家所称的，是“辉煌的 30 年”（按他的观点，繁荣一直持续到 1973 年）。

我们的材料清楚地显示出，这些年代的辉煌——普遍的繁荣、生活水平向上攀升和相对充分的就业，可能早在 1967 年就结束了，但到 1973 年肯定是结束了，那时世界经济的衰退由所谓的欧佩克石油冲击而被突出地表现出来（但确实不是由它引起的）。关键因素无疑是全世界的利润水平已开始下降。对它的解释似乎是直接的。尽管在 50 年代，主导部门在世界层次上已相对地由少量企业集团所垄断，但到 60 年代，竞争者数量已在大量增加，使这些领域变得拥挤。

70、80 年代则标志着生产增长全面的大幅下降，如果考虑到人口的持续增加，或许世界人均产出也是在下降的。正如所预期的，它同时还伴随着主动失业的增加。当然，它造成的后果在空间上的分布是不一样的。而且，负面影响在地理分布上也是不断变化的，因为各国都会尽其所能将损失降到最低，“将失业输出”到其他国家（或努力这样做）。但总体上看，比起先前的康德拉季耶夫 A 时期，趋势是停滞的。尤其是，根据总产出、总实际产值或利润率衡量的跨国公司引人注目的扩张，在大多数时间上大大放慢了速度。

可以确信，各国在不断地做出努力以克服世界性的总有效需求的不足。70 年代油价上涨在两个重要方面对此发挥了作用。燃料能源成本的剧烈上升明显增加了各地的生

产成本，因而也就形成了减少世界产出的压力，由此而使产出与有效需求更趋一致。油价的上涨也成为在全世界削减剩余价值的一种手段（当然，作为 GDP 的比率，它对第三世界的影响最为剧烈）。最后，这一财富部分是作为由石油生产者（在极少数的国家中，大多是国有企业）消费的租金被分配，部分是作为由跨国石油公司消费的租金（或无先例的高利润）加以分配，部分是作为投资于核心区国家银行的存款而予以分配。然后这些存款在 70 年代以贷款的形式投入边缘区和半边缘区国家（包括那些在社会主义集团中的），实现“再循环”。

这些再循环资金能够使边缘区和半边缘区的多数政府解决它们在 70 年代遇到的收支平衡困难。这些困难部分是由油价上涨引起的，但同时也是由康德拉季耶夫 B 时期边缘区产品的贸易条件不断恶化所引起的。这些借款被用于进口商品，当然主要是从核心区国家进口，由此而暂时弥补了对核心区国家出口需求的下降。但这种超大规模借款的刺激作用不可能持续。不断增加的偿债成本不可避免地导致了 80 年代的债务危机。

生产部门利润率的下降产生了三个值得关注的结构性后果。第一，它导致对减少生产成本的迫切要求。在经济下降期的一个典型方式就是将生产地点从核心区转移到半边缘区和边缘区，以期望能显著减少劳动力成本。这一转移始于 70 年代并有了较为实质性的进展，在 80 年代进一步加速。^①

第二个结构性后果是，为寻求利润，投资从生产领域向金融领域大量转移。它导致一系列重要公司被金融商所接管（它们被很好地记录下来）及低风险债券（Junk bond）^② 交易的繁荣，而这些由于主要公司盈利能力的下降变得更为可取。当然，这些金融操作在已严重负债的私人部门也会发生遭遇未卜的风险，像美国储蓄与贷款银行破产就是例子。

第三个结构性后果是军费支出的增加，它作为反周期的凯恩斯主义手段，在经济紧缩时期更容易被政府接受，以实现政府开支的增加。主要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是第三世界国家开始大量从各大国——尤其是从美国——购买武器，当然也从一些半边缘国家购买，它吸纳了由油价上涨而产生的利润。这无疑带来第三世界国家内部暴力行为数量的增多，同时也使内战形势更加严峻。

军事凯恩斯主义的第二种形式是美国自身在 80 年代军备支出（同时，在较小程度上，苏联也在增加）的增加。尽管美国采取的增加军事支出的政策多半减少了失业水平，至少在美国是如此，但由此带来的却是美国债务水平的大幅度上升。世界经济因而在 B 时期产生了三个主要的债务源：第三世界（和社会主义）政府、大公司企业和美国政府。

^① 这种转移到 1977 年就已很明显，而且被大量材料记录下来，并在弗洛贝尔（Fröbel）1980 年编辑的书中予以理论上的解释。

^② 风险债券，指以低于面值价格购买而承担较大风险的未正式注册的公司债券。——译者

这些变迁对劳动力所产生的影响，反映在曾就业于主导部门的工人的实际工资的不断下降和失业的增加（或就业不稳定）。但由于这些主导部门恰恰是工会组织最强大的部门，所以也就大大削弱了劳工运动。这也伴随着世界范围内劳动形式的变化，即较少法律保护的劳动形式（家庭劳动、非正式经济下的劳动）以及分包制的扩展。这一转变，事实上在全世界带来了工资劳动力数量的扩增，而同时也是平均工资水平的降低和以工资劳动形式计算的总劳动时间的平均水平的下降。

世界经济的下降趋势伴随着在边缘区粮食生产的剧烈下降，这主要有两方面原因。在 A 时期，核心区国家借助援助方案大规模增加了其粮食出口，由此而替代了当地的粮食生产。边缘区的这种新的粮食依附性随后就在 B 时期加重，那时，这些国家努力尝试转向出口导向生产，以解决收支平衡问题，于是粮食生产区被进一步转化为工业生产或非大宗出口作物生产的地区。

由此产生的饥饿与无家可归加剧了从农村向城市的移民，但这与 A 时期的移民有着显著的不同。在前时期，部分移民是在第三世界内部发生的，而且主要是移向大的和/或首都城市，目的是寻求工资就业，这是在国有部门扩展的背景下发生的。目前，这种移民集中在更接近所在农村地区的较小城镇，以便于寻求季节性的、非正式的临时工作。它所造成的一个结果就是拉平了城乡间的差别，这一点是我们将要考察的。

根源于国家获取收入潜力下降的国有部门的衰落，不仅导致劳动力的重构，而且导致国家在维持和提高教育与医疗设施水平能力的显著下降。这一点在全世界都是一样的，被视为是由于民众暴力和政府服务减少所导致的城市环境恶化的一个普遍问题。

世界跨地区的移民模式也开始发生变化。在 A 时期，由南方国家向北方国家的移民被北方国家纳入大致的计划并予以鼓励。但经济停滞导致核心区国家就业压缩，可以预料，对合法移民的欢迎程度一定会下降。但目前在核心区雇主们雇用低收入工人的需求在增加，实际上他们与那些设法逃避边境控制组织非法移民犯罪集团的勾结，大大增加了非法（或无合法证明）工人的流入，这种现象又由于边缘区政治、经济（因而安全）状况的恶化而进一步加剧。

在 B 时期，女性劳动力找到了更多的工作，但这并不表示在工作上实现了更大的平等。一方面，她们能够获得更多的工作机会是由于她们在社会上处于低工资水平。既然她们增加就业经常是以男性工人失业为直接代价，因而这似乎是在某种程度上减少了男性与女性工人在工资统计上的差距，但这一差距主要是通过男性工资水平的下降来实现的。另一方面，在这些有男性与女性工人收入的家庭，以现金衡量的家庭总收入在下降，由此而加剧了实际工资的下降。而且，非全日制工资劳动数量占所有工资劳动数量的比率在全世界都在上升，而雇用非全日制工人的雇主更倾向于吸纳女性劳动力。由此可见，尽管更多的妇女已投身于世界各地的工作场所中，但她们所处的附属地位是非常明显的，因为由妇女所完成的工作比率中全日制的越来越少。

当然这一切还带来了许多不良的生态后果。50、60 年代初级资源消耗的巨大增加，

正是世界生产的大扩张所致。70、80年代却并未出现类似的扩张。但较大成本的生态破坏已经从核心区转移到了边缘区和半边缘区。

二

美国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至少是从19世纪70年代稳步强大起来的。随着英国霸权进入了它的B时期，美国作为世界市场上的竞争者凸显出来，其主要竞争对手是德国。这一竞争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达到顶峰，两次大战实际被视为是从1914—1945年长达“30年的战争”，最终如我们所知的是，以美国和其盟国无条件的军事胜利而告终。

在1945年，美国是那个时代唯一的主要工业国，它从军事冲突中脱颖而出，不仅固定资本没有任何的物质损耗，恰恰相反，其生产和效率反而得到巨大加强。它将这一经济优势很快转化为一种政治、军事甚至文化优势，使之持续到战后初期并进一步加强。因而，1945年标志着美国在世界体系中绝对主宰或霸权地位全盛期的开始。美国实力在此后25年左右愈来愈强大。

在1945年，美国之外唯一具有显著地缘政治和军事实力的国家就是苏联，就世界体系的长期结构目标而言，该国的官方意识形态似乎是将自身置于与美国的直接冲突中。但苏联并不拥有接近美国的生产实力（更不要提商业或金融实力）。其号称强大的军事实力也从未被直接检验过，因为美苏双方都竭力避免军事冲突。但不管怎样，在可能爆发的完全规模的战争中，美国拥有最初的核优势，而这种优势至多也只能通过苏联掌握核弹技术及双方继之的军备发展予以抵消。苏联在世界舞台上的政治吸引力尽管很大，但在1945年时还很难预料的。美国在世界体系中对道义领导权的要求，尽管时常遇到很强的竞争，但经常能获得广泛的听众，尤其是在西欧和日本。

对1945年以后美苏关系的评估，主要包含在两个词语中：冷战和雅尔塔。冷战代表着总体的对抗，尽管是以（相对）冷静的形式出现。雅尔塔则相反，代表着彼此迁就（或对一些人而言是美国对苏联“出卖一些利益”）。事实上，回溯1945—1967/1973年这一段岁月，既非是总体的对抗，也非是彼此迁就/“出卖”。

事实是，尽管存在着宣传上的鼓噪及战术上的动员，但美苏关系主要是一种彼此自我限制的关系。在连续的主要军事——政治对峙中（希腊内战、封锁柏林、朝鲜战争、金门—马祖争端、古巴导弹危机），最终决定性的处理基调似乎是谨慎的、而且是意在维持现状的。根据世界体系作为一个整体的宣传，苏联“阵营”在苏联的压力下建立起来，在该阵营苏联的权威是不受丝毫限制的，而且该集团最少参与着全世界的商品流通，在欧洲完全尊重1945年确立的军事分界线。进一步看，冷战的宣传能使美苏双方在各自的区域内行使很强的支配权，经常不会遇到来自其他国家的明显挑战（德意志民主共和国1953年、波兰和匈牙利1956年、捷克斯洛伐克1968年、伊朗1953年、危地马拉1954年、黎巴嫩1958年、多米尼加共和国1965年）。

美国努力与所有主要的工业国建立政治—军事联盟—西欧、日本、白人民主国家。这要求美国最初在这些国家物质重建和更新投资上给予重要援助，这种援助方案就促成了美国的政治优势（跨国体系中的一个“自由世界”阵营）、军事安全（北约、美日防御条约、澳新美安全条约）和经济发展机遇（由美国跨国公司进行的对外直接投资）。这种无意识中产生的美国领导权及美国在世界舞台单边决策的习惯在文化领域也有相应体现：美国的学术组织在所有知识领域中都上升为核心地位；纽约成为世界艺术之都；以及所谓的世界大众文化的“可乐——殖民化”（但首先是在其核心区工业化的盟国中）。

在边缘区，这一时期表现出了相对繁荣的特征，对基础设施、教育和医疗设施的投资在扩展。这一地区在形式上仍处于殖民统治的那一部分，民族主义运动的力量正在稳步增强。殖民强国——在大部分地区是勉强地——启动了“非殖民化”方案，首先在整个亚洲，然后在非洲、加勒比和大洋洲地区。一般而言，这一进程进行得相对平稳，尤其是在英国的殖民地，这意味着它是相对和平的过程（有一些著名的且引起充分关注的例外）。美国鼓励权力向“负责任”的独立运动力量的这种和平的、极少破坏性的转移，尽管美国并未对欧洲殖民强国施加过多的压力。不管是出于何种理由，在殖民国家拖延其撤出步伐的地方，民族主义运动都会表现出它们强力推进这一步伐的愿望和能力（荷兰在东印度，法国在印支、阿尔及利亚和肯尼亚，葡萄牙在非洲的殖民地），它们有力的反殖民动员不仅对它们自身、而且对它们的邻国和那些同样被殖民的国家，都产生了丰硕成果。

在美国霸权统治下的这一世界经济强大扩张时期，根据经济和社会凝聚力的指标衡量，美国做得尤其好。它确实消除了劳资冲突，而这种冲突在30年代曾是如此剧烈。熟练工人和较低中产阶层的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他们目前开始将住房和汽车的所有权、耐用消费品、休闲活动和对子女较高的教育作为正常的预期加以享受。对黑人的严重盘剥由于黑人较高工资就业比率的显著提高而减轻，与此同时是城市化的发展和合法隔离的终止（首先是在军队中）。这些措施的推行，加上意识形态领域内凶猛的反共讨伐，再加上得自美国霸权的明显利益，似乎促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高度的民族团结。

然而，到1967/1973年，由美国霸权扭结在一起的东西两部开始变得松散，而这似乎正是由于美国在确立其霸权权威的巨大成功所引发的。最严重的问题是由核心区其他国家经济实力的增长所引起的，尤其在西欧（主要是联邦德国）和日本。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模式的变化非常明显地表现了这一点。尽管最初这种投资几乎完全是以美国为基地的跨国公司，但先是欧洲的、然后是日本的公司，开始在这种总投资中占据愈来愈大的比率。在增长率全面放缓的情况下，这一点对美国公司构成尤其严重的威胁。

金融结构中演绎着同样的模式。第一个困难的信号是60年代初所谓欧洲美元——指完全由欧洲控制的美元——的出现，它不受美国直接的金融控制，从而弱化了美国的金融影响。到60年代末，又出现了美国黄金储备的大幅下降，以及由越南战争支出所

引起（但不能单独由它来解释）的黄金大量外流，这一切使美国在金融领域的困境进一步加剧。

美元与黄金固定交换比率的废止无疑将减轻美国黄金供应的压力，但这仅是以在美国单边控制之外形成一种世界通货的易变性状态为代价。在随后的 25 年间，美元对其他主要国家通货的汇率在大幅下降（当然，变化过程是有升有降的）。到 1990 年，甚至自 1945 年以来几乎所有世界经济交易都由美元来结算的惯例也遭到了质疑。

一个主要结果就是美国政府（财政部与联邦储备委员会）失去了对世界金融市场的有效控制权，而与之竞争的其他决策中心却在兴起——其他国家机构（例如，德国联邦银行）、苏黎世的银行家们及三个密切关联的跨国的世界金融/经济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关贸总协定）。发起于 1977 年的西方七国经济首脑年会本身就是美国经济衰落的一个重要结果，它成为核心区主要国家间协商决策的一个场所。世界体系正处于金融全球化这一“必然进行的冒险”中。^①

当然，在核心区的其他大国也都得出了它们各自适当的地缘政治结论。戴高乐时代法国同美国疏远（包括撤出北约指挥机构）成为这一过程的先驱。紧接着是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的新东方政策和欧洲商品供应线的建立。欧洲的联合开始散发出其反苏、反大西洋主义的味道，而倾向于一种更为自主的氛围。

第三世界不愿再等待殖民强国控制的非殖民化进程的恩赐，它们开展了一系列有影响的运动：首先是由中国共产党组织的运动，稍后对殖民势力产生更大削弱影响的是越南、阿尔及利亚、古巴和南非的民族解放运动。吸取它们的经验，伊朗革命乘世界体系（尤其是美国）调整的混乱期爆发，尤其是霍梅尼（Khomeini）及其支持者完全不愿再尊奉国家间长达 500 年之久的外交常规。大魔王的鼻子被重重地拧了一下，卡特先生派出的营救直升机在沙漠中失事，而里根先生则发现他必须用金钱来赎买美国人质的自由。

当尼克松总统宣布其“让亚洲人打亚洲人”的政策时，他同时也是在承认美国对世界体系直接军事干预的有限。创设次帝国主义的地区守护国的做法，实际上是用容易被罢黜的伊朗国王^②来代替美国直接干预的模式，它的效果是有限的。然而，这并没有放缓第三世界愈益加快的军事化进程，其中美国的利益现在变得更直接具有商业性，而较少是一个中间策略问题。诚然，美国的商业需求已变得非常强烈。可以确信，美国是想保留对最先进武器的控制，或至少是限制对它的获取。事实上，尽管美国当然在积极反对，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在 80 年代一直在加强，并已达到这样的程度，即核武器、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已成为许多半边缘区武器库中的一部分（即使后者仍迫于巨大压力而公开否认拥有这些武器，或被迫将它们的核潜力维持在一种初备状态）。

① 这是阿格利埃塔、布伦德和库德特（Aglietta、Brender and Coudert）在 1990 年著的书名。

② 指间接干预模式。——译者

1968 年的世界革命^①同时也成为世界各地对世界体系中美国霸权的一种抗议，但该抗议同时也是反对苏联的，谴责它与美国霸权实际上的勾结。不仅如此，革命还进一步对历史上主要的反现存体系运动——社会民主人士（工党成员、美国支持新政的民主党成员）、共产党和民族解放运动——都无例外地做出本质性批判。它们要求一种全新的战略，一种更少能为美国霸权自由主义所同化的战略。它要求有效地突破旧的反对现存体系的运动，但它同时也标志着美国对各种反现存体系运动的同化战略开始趋向终结。

80 年代末苏联阵营的解体及稍后苏联自身的分裂，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即摧毁这一阵营是美国自 1945 年以来世界政策的最（或一个）主要目标，才能被视为是美国的一场胜利。就美国在世界体系中的霸权来说，维系国家间关系的冷战的结束，可以更恰当地视为是对美国优势地位的致命打击，因而也可以被视为是背弃美国政治愿望而发生的事情。

美国在 70 年代相对实力的下降助长了勃列日涅夫政府对雅尔塔条款的蓄意歪曲，突出体现在阿富汗问题上。美国利用苏联这次新的武断行动，在 80 年代，有效地抑制了西欧和日本从美国的世界领导权中谋求政治自主性的努力。

由债务危机而加重的世界经济停滞，在 80 年代，动摇了边缘区和半边缘区国家政府的稳定地位。政府法定地位的危机，在那些已经宣称鼓励反对现存体制力量存在的国家表现得尤为突出，首先是 1980 年的波兰，接着是一长串的例子，诸如巴西和阿根廷军政府的倒台，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FLN）的危机，以及印度国大党令人心痛的衰落。在整个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的财政危机导致内部支持民主的起劲鼓噪，而同时也被迫实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强加的调整政策。以东方为中心的欧洲共产主义的瓦解，仅是这一系列事件发展的极点。

1990—1991 年的海湾战争危机这一美国取得军事胜利的戏剧性事件，从两个角度反映出美国在世界体系中的实力正在衰落。第一种表现在如下事实中，即这一危机是由伊拉克蓄意挑起的，而且该国政府抵制了所有避免战争实际爆发的努力。从 1945 年以来，这是第一次对美国的如此挑衅。在其他美国实力被检验的实例中，挑衅都是秘密的和心照不宣的（封锁柏林、古巴导弹危机），从未最终引致战争。现在，它却被对抗性地予以挑战，伊拉克人无力打赢这场战争同他们的这种先创之举相比，倒显得不太重要了。

第二，很明显，美国能赢得这场战争仅是在两个条件的基础上：它是在联合国名义下集合各方协作实现的，同时它也是由外部提供资金来完成的。第一个条件表明了对美国新的政治限制，第二个条件则表明美国对以前受庇护国家在财政上的新的依赖关系。美国尽管取得了胜利但却不能废黜萨达姆——侯赛因的事实印证了这一点。

^① 指 1968 年欧美的学生运动。——译者